

# 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影响与前景

范家麒<sup>1</sup> 许利平<sup>2</sup>

**内容摘要：**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全球数字转型的不断深化，发展中经济体的本土数字平台也开始迅速崛起。其中，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在东盟以及全球南方中具有代表性。借鉴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资金、政策和用户的分析框架，演绎并论证了在以上三要素的演化和互动下，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将先后经历萌芽期、增长期和瓶颈期三个阶段。研究表明，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印尼的消费鸿沟，为印尼产业升级打下了基础，也成为印尼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但与制造业的联系尚不够紧密。印尼政府重视推动本土数字平台的包容性发展，而本土数字平台发展也契合当前“数字下游化”的发展趋势，前景向好，但其在国内的政治定位还不清晰，且国际发展仍面临阻碍。基于本土数字平台的合作将成为中印尼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方面，这有助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突破发展瓶颈。中印尼之间的数字平台合作还能促进地区内的数字互联互通，并为全球南方数字合作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印尼 本土数字平台 资金 政策 用户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 (2026) 01-0108-19

**DOI:**10.16407/j.cnki.1000-6052.2026.01.004

数字平台拥有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能够跨时空、跨国界和跨部门地集成各种经济活动（谢富胜等，2019），是各国数字转型的重要支柱。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层面的扩散，这些数字平台开始走向世界并逐渐成长为跨国数字平台，为全球数字互联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跨国数字平台在全球市场上并非所向披靡。在部分场景之下，跨国数字平台需要针对市场特征对其产品与服务进行本地化改进，却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各国的市场特征，这就给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夏敏等，2025）。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各国本土数字平台正经历迅猛

收稿日期：2025年7月13日

作者简介：1. 范家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南亚区域国别、印尼政治经济。北京，102488。

2. 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兼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南亚区域国别、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印尼政治经济。北京，100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建‘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4AZD034）。

发展,已经逐渐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在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与平台监管、平台治理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部分本土数字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垄断”的现象。此外,由于本土数字平台与跨国数字巨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关系,部分国家为扶持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实施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主义政策,招致了一些反对。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数字平台也开始了国际化发展旅程,因此加强对其他国家本土数字平台的研究尤为必要。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也是本土数字平台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构成了上述研究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案例。印尼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据印尼普拉萨斯蒂政策研究中心(Prasasti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统计,印尼2024年的数字经济总量达到约1 860万亿印尼盾(约合1 172亿美元),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 200亿~3 600亿美元。<sup>①</sup>印尼人口总量约为2.8亿,人口结构年轻且对数字化接受程度高。目前,印尼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生态,出现了多个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级别本土数字平台,且部分平台还正在尝试向其他国家拓展业务,初步具备成长为跨国数字平台的能力。因此,本文拟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进行学理化分析,评估其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前景,以期丰富学界对全球范围内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知识体系。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研究也将为推动地区数字互联互通,以及中国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双循环,打造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参考。

##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本文将本土数字平台定义为那些以某个单一国家为主要营业范围,从业人员及高管也以该国公民为主的数字平台。在既往文献的基础上,借鉴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本文提出一个包含资金、政策、用户三要素的理论框架,以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

### (一) 文献回顾与评述

围绕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这一研究议题,现有文献的讨论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文献从市场的角度展开分析,基于数字平台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分析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共性与特性。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人口带来的市场红利、快速增长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年轻群体对数字经济的接受程度等市场特征推动了印尼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借助这一优势,印尼市场已经培育出了多个土生土长的大型数字平台(欧月明,2023)。印尼市场的进入门槛也相对较低,国内资金量较少,竞争烈度相对较低,国际数字企业向印尼进行投资的机遇较多(林梅和周漱瑜,2020),这加快了国际先进数字技术与经营方式向印尼的扩散速度。此外,学者们也从网约车、电商、在线旅游、在线媒体和娱乐、

互联网金融、数字农业等领域的微观案例入手，对部分本土数字平台在印尼的发展和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印尼民众生活痛点的熟悉程度与对市场规则的灵活把握是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重要原因（Prasetyo, 2024；尹楷珺, 2025；李若昕和张帅, 2025；Park 等, 2025）。

第二类文献则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影响。印尼政府推出“2021—2024年数字印尼路线图”，旨在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培养数字人才，提出六大数字战略方向，为经济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潘玥, 2024）。夏方波（2021）从印尼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印尼政府通过积极建立政府监管制度体系来推动数字平台向合规方向发展，并将跨国数字平台作为经济外交的重点工作对象，以期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帮助，取得了不俗成效。有学者关注到了印尼近年来对数字创意经济的重视，分析了印尼数字平台与创意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在创意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ellyana 等, 2023）。不过，也有学者分析了数字平台发展的负面影响，认为当前印尼政府尚未对数字平台之间的无序竞争进行有力监管（Lee, 2022），担忧平台发展带来的数字不平等和劳动剥削（Hisyam 等, 2024），需要保护消费者免受数字平台算法“黑暗模式”以及个人数据泄露等的侵害（Hayati, 2024；Muin, 2023；Tobing 等, 2025）。

数字经济作为印尼国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关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这一研究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鲜有文献从行业发展的视角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进行分析。过去十余年印尼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这一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本土数字平台的业务聚焦于印尼市场本身，因此其对国民经济具有更强的支撑作用。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借鉴，值得从行业的视角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从影响因素来看，现有文献对推动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各项要素的分析也相对孤立，统合性的分析研究不足。上述从国家和市场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献实际上是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分析。然而，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本土数字平台的行业发展轨迹，需要对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从时间维度上看，少有研究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行业发展历程进行历时性的分析，而行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将时间因素引入分析框架之中能够更清楚地发掘不同要素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更好地为跨国分析提供理论借鉴。

## （二）理论框架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拟借鉴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来构建针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分析框架。生命周期是产业经济学在分析技术、产品和行业等发展时的常用范式。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生命周期的分析范式较少关注短时段内的成本收益问题，而是在引入时间

维度后,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段内行为模式的差异,来更好地描述事物在长时段内的发展,以便于决策者能更好地识别并抓住创新等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Vernon, 1966)。从既往研究来看,行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先分析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各项因素,再对生命周期进行阶段划分(张镓等, 2019; 郎昆等, 2023)。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并划分阶段是本文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引入生命周期的范式具有可行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学界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形态尚无定论,因此本文暂不讨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衰亡期,而是将其可预见的发展轨迹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这一行业来说,资金、政策和用户是影响其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资金因素,充足的资金支持是本土数字平台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数字平台的成长一向具有“烧钱”的特征。相比于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平台虽然大多为轻资产运营,平台搭建完成后的数字服务产品也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但运营初期为了快速积累用户以形成网络效应,数字平台往往会提供大额甚至全额补贴,因此在前期需要资金投入来缓解入不敷出的局面。对于人均收入仍相对较低的印尼来说,数字平台的客单价不高问题使其在发展初期更加依赖资金的支持。随后,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完成了初始的平台启动后,数字平台仍然需要不断地进行资金投入来进一步拓展市场,以求“竞赢”同类数字平台。即便在某一赛道上奠定了头部企业的地位,数字平台也经常需要对上下游企业进行并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来自国际先发数字企业的投资还会为本土数字平台带来技术支持,加速平台成长。可见,资金因素始终贯穿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

其次是政策因素,政府政策扶持是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由于本土数字平台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将本土数字平台视为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国政府的热门选择。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兴领域,数字平台的发展将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相关问题往往是法律监管的模糊甚至空白地带,容易产生纠纷与矛盾。因此,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及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政企之间的高效沟通,将为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不过,政府在扶持本土数字平台发展之余,也会防范因平台过度扩张而导致的治理失效。总之,政府的政策调整将对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轨迹产生关键影响。

最后是用户因素,本土数字平台连接的用户数量是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数字平台的发展伴随着对双边市场的连接,但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制造业也不如各数字发达国家发达,双边市场中的企业端相对来说更容易融入本土数字平台。与企业端相反,印尼不仅拥有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还有更多亟待接入平台的潜在数字用户,连接用户成为比连接企业更为重要的事项。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定律指出,数字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这一论断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印尼

来说更为成立。对企业端来说,拥有更多用户的数字平台显然也值得其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经营。可见,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是用户驱动的。

结合既往文献,本文使用上述三个因素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进行演绎推理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萌芽期,特征为具有平台性质的数字企业在印尼出现并初步商业化。受全球数字转型的影响,印尼开始产生经济数字化的需求,而国际数字平台的本地化服务能力不足催生了本土数字平台的产生。受后发地位的影响,萌芽期的本土数字平台较为依赖外国投资及其附带的技术来生存。向来倚重外资进行发展且重视现代化发展的印尼政府显然将关注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然而受限于平台规模较小和领域分散等,政府很难出台精准的扶持政策,这使得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具有“野蛮生长”的特性。此外,由于印尼用户的数字消费习惯仍在形成之中,本土平台的用户积累也停留在单一行业。

第二个阶段为增长期,特征为本土数字平台蓬勃发展,迅速融入印尼社会生活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由于平台发展具有“虹吸效应”,且从各数字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头部数字平台的发展情况往往是行业的风向标,因此头部平台的出现成为本阶段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重要表现。此类头部数字平台由于集聚了大量的本土用户而逐步具备了资金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使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为政府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提供了基础。头部本土数字平台独立性的提升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并为跨领域用户拓展提供了条件。可见,增长期内本土数字平台与资金、政策和用户三要素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

第三个阶段为瓶颈期,特征为本土数字平台仍有增长但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尼作为正困于“过早去工业化”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本土数字平台的投资与收入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其发展并不稳定。而政府换届等因素带来的政策变动,以及因数字基础设施普及不足等因素带来的用户增长停滞等问题都将对平台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从平台经济的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破除瓶颈期的可能路径之一在于国际化发展,但也受限于资金规模等而困难重重。整体来看,资金、政策和用户三个要素的变动均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而引发瓶颈期的到来。本土数字平台的三阶段发展轨迹可参见表1。

表1 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轨迹

阶段	资金	政策	用户	行业特点
萌芽期	依赖外部投资尤其是国际投资	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分散与粗放	处于用户快速积累阶段,但以单一领域为主	仍在探索发展模式,尚未能构建起数字生态系统
增长期	开始具备一定的资金独立性	政府开始给予本土数字平台一定的定向支持	随着业务的横向扩展,用户积累向跨领域增长转型	对国民经济影响力初显

续表

阶段	资金	政策	用户	行业特点
瓶颈期	资金独立性更强,但头部平台实力仍不如国际资本集团	国内面临更多政府监管,国际上失去“本土”身份	国内用户积累面临瓶颈,国际用户积累更受限制	数字生态系统构建逐渐完善,但难以再现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依据上述分析框架,下文将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便更深入理解资金、政策和用户三要素在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轨迹中的作用机制。随后,本文将以此为基础,讨论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对印尼整体经济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 二、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

当前,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经营范围已经涵盖了出行、零售、金融、旅游、求职、教育等多个领域,然而其发展历程实际上只有短短二十余年。21世纪初,印尼最早接触到互联网的群体自发创建了一些数字社区,并在这些社区中进行简单的社交或商业宣传活动。这些数字社区具有数字平台的雏形,可以认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萌芽期。随着印尼互联网用户的迅速壮大,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商业化。2016年下半年,印尼诞生了首家本土数字平台“独角兽”,2017年本土“独角兽”平台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了四家,因此本文将2017年作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进入增长期的关键节点。然而,在2024年后,印尼还未能出现新的具有潜力的本土数字平台,原有的部分头部本土数字平台又在国内和国际发展中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危机,这意味着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逐渐进入了瓶颈期。

### (一) 萌芽期(21世纪初至2017年)

自21世纪初开始至2017年是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萌芽期。本阶段内,绝大多数本土数字平台体量较小。在资金、政策和用户三方面因素的助推下,部分本土数字平台开始脱颖而出,并融入到更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在资金方面,萌芽期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普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尼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前景得到多方看好。然而,在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条件优越的情况下,东南亚的数字平台“独角兽”却率先诞生于新加坡,原因在于印尼国内资本量不足,难以支撑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而印尼的营商环境又长期被外界诟病,外国资本对于进入印尼市场持观望态度。与之相比,印尼的邻国新加坡拥有地区内最健全的市场管理体系,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大量的支持政策,多数国际资本选择立足于新加坡发展面向整个东南亚的平台经济。

不过,在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努力下,部分国际资本开始尝试进入印尼市场。公开资料显示,如今印尼的头部本土数字平台大多在2017年之前拿到过早期轮次的投资,参投方既有印尼著名财团,也包括国际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国际资本对印尼市场

特征的理解显然同印尼本国有一定差异，因此如何维护与国际资本的良好关系，成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获得投资的重大挑战，若出现沟通不畅，将直接影响到本土数字平台的生存。举例来说，如今印尼著名电商平台T公司，在其发展的萌芽期就曾因为创始人不懂英语等而无法找到有合作意愿的国际资本，险些倒闭，最终幸运得到国内资本的青睐才渡过难关。由于对外资的依赖较高，萌芽期内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自主性较低，也较难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政策方面，印尼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规则与发展规划的制定上。由于多项与本土数字平台相关的经济活动在印尼尚是首次出现，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监管，这使得制度建构成为印尼政府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2016年，印尼政府先后推出了《第19号关于信息与电子交易法的修正案》(UU 19/2016)，以及《第20号关于电子系统中个人数据保护的通信信息部长令》(Permen Kominfo 20/2016)，对个人数据与信息传输进行了初步的法律规定。印尼每五年均要重新制定一次国家中期发展规划，而在2015—2020年的中期发展规划中，印尼将数字金融服务、地方数字治理、数字传媒和数字包容发展等事项纳入了文件中，有关数字的论述相比于此前的中期发展规划要丰富不少。在国际上，印尼政府还积极开展数字经济外交，时任总统佐科就曾带领印尼本土数字平台高管访问硅谷等地，希望国际数字巨头能够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帮助。<sup>②</sup>

不过，印尼政府对处于萌芽期的本土数字平台较少进行针对性的扶持，前述提及的多项规划仅仅局限于对数字发展目标的描述，并未特别指明支持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也没有对适合平台经济发展的经济领域进行特别照顾，这种粗放式的政策曾招致一些批评（夏方波，2021），但客观来说，处于萌芽期的本土数字平台本身发展方向未定，因此印尼政府只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人才培养等宏观层面施策，为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尼政府仍能够识别出有潜力的本土数字平台。例如，由于网约摩托车影响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收益，自成立以来其经营是否合法一直饱受争议。2015年12月，印尼交通部曾以“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至少要有三个轮子，具有合法地位并拥有公共交通经营许可证”为由，禁止了网约摩托车手机应用的运营。<sup>③</sup>很快，时任总统佐科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提出“只要人民需要，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并强调政府不应该禁止创新。<sup>④</sup>在他召见了交通部部长后，禁令被解除。如今印尼最具特色的本土数字平台就脱胎于网约摩托车行业。可见，政府政策仍然对处于萌芽期的本土数字平台起到了助推作用。

在用户方面，印尼的数字化转型是本土数字平台用户拓展的重要推动力。从互联网接入率来看，印尼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原因在于，印尼虽为“亚洲四小虎”成员之一，但在四国中比较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不算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同时，印尼的英语普及率也并不高，但2010年左右印尼可使用的大多数数字服务仍然以英语作为媒介语言，民

众急需使用本土语言、提供本地化内容的数字平台。<sup>⑤</sup>随着印尼互联网接入率的不断提升,更加贴近本国民众使用习惯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逐渐积累起可观的用户群体。以创立于2010年的印尼本土网约车数字平台G公司为例,其在营业前五年只是一个非数字化的呼叫中心,直到2015年才推出手机应用正式转型数字平台,但很快就广泛流行。显然,社会的数字转型进程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作出了关键贡献,本土数字平台也依托用户增长逐渐积累起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然而,处于萌芽期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均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的核心业务,在用户积累方面仍停留于单一领域。因此,从用户上看,萌芽期内的本土数字平台在生态系统构建方面还并不成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有限。

总体来看,尽管并未得到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但在外部资金、数字制度建设以及数字用户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处于萌芽期的本土数字平台逐渐从无到有,成长为印尼国内不可忽视的数字服务提供者。

## (二) 增长期(2017—2024年)

2016至2017年,四家分别专营网约车、旅游和电商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先后成为“独角兽”企业,<sup>⑥</sup>标志着本土数字平台跨越了萌芽期,进入增长期这一新阶段。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来说,进入增长期并不仅仅是商业估值的提升,其与资金、政策和用户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都产生了新的变化。

在资金方面,本土数字平台逐步走向自给自足。一方面,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获取资金的方式更为多样,而非仅仅依靠大型资本集团的投资,这使得其资金的流动性得到显著提升。除业务营收外,上市也是本土数字平台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印尼本土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近年来逐步完善,不少本土数字平台均选择在印尼国内上市。印尼证券交易所(IDX)是印尼目前唯一一家证券交易所,已经有多家本土数字平台在该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此外,部分平台还计划继续在国外进行双重上市。另一方面,度过了前期大量“烧钱”以追求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后,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回收成本的需求,本阶段的本土数字平台开始将盈利纳入日程。多家头部本土数字平台均于加入“独角兽”行列后宣布将盈利作为主要目标,并承诺将降本增效。不可否认的是,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对外部资本依赖的降低也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相关,但本土数字平台追求资金自主性的大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在自身募资能力增强和投资风向趋于稳健的影响下,本土数字平台在本阶段的自主性得到了明显提升。

在政策方面,印尼政府不仅继续在法律法规方面进行查漏补缺,其对本土数字平台的支持政策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以全球数字治理中重要性最为凸显的跨境数据传输为例,为了应对数字先发国家以“数据自由流动”为名而实行的数字霸权政策,印尼政府在前续法律的基础上,于2022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PDP Law),要求实行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并强调个人数据出境后需要得到与印尼境内同等的保护水平,作为东盟

国家中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这一政策显然利好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印尼政府及官员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对头部本土数字平台进行“点名”支持。例如，在印尼本土电商平台受到社交电商潮流冲击时，印尼政府迅速推出了社交电商禁令，这也被认为是政府对本土数字平台的保护。可见，由于增长期内的本土数字平台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行业领先者，印尼政府终于具备了对本土数字平台行业进行精准干预的条件。

另外，处于增长期的本土数字平台也不再局限于被动接受政策扶持，而是具备了能动参与政府治理以及政策制定的能力。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由于地方政府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力，印尼各地区在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方面有各自不同的方案，而本土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例如，雅加达政府已经推出了一款名为JAKI（Jakarta Kini）的数字应用来一站式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多功能系统集成问题，目前已经与电子商务、支付、求职等领域的多个数字平台达成了合作协议，其中大多数平台来自本土。新首都努山塔拉将智慧城市作为建设目标之一，目前也得到了多家本土数字平台的支持。在数字支付方面，印尼具备数字支付渠道的各本土数字平台也均加入了印尼政府于2020年设立的统一付款二维码（QRIS）项目中，便利了民众的生活，成为企业赋能政府进行数字治理的典型案列。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已经开始成为政府进行数字治理的重要载体。

在用户方面，虽然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是本土数字平台拓展客户的重要助推力量，但其自身生态系统构建的逐步完善也对用户群体的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增长期的本土数字平台由于已经在领域内站稳脚跟，终于有能力利用数字平台发展报酬递增的特点进入其他领域，构建基于平台的数字生态系统。以主营线上叫车和电子商务等B2C业务的数字平台为例，其在萌芽期时还以单一业务经营为主，但进入增长期后已经开始向物流、仓库管理、支付和借贷等B2B和其他B2C业务拓展，并且存在纳入更多新兴领域的趋势。其中，数字金融领域由于在数字生态系统构建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各本土数字平台竞相拓展用户的重要方向。以印尼当前头部本土数字平台G集团为例，其旗下的数字钱包在印尼使用率稳居前列。由于电子钱包具备诸多便利，尽管并非该本土数字平台的核心主营业务，但电子钱包已经成为其维持地位的重要保障。

除了上述自主发展的方式外，本土数字平台还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来实现跨领域经营。增长期的本土数字平台在资金自主性方面已经有较大的提升，对其他中小型企业的收购具备能力支撑。这种收购有可能是对同类平台的收购，目的是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降低市场竞争烈度；也可能是收购与其形成业务互补的公司，目的是完善自身的数字生态系统。印尼当前最大的本土数字平台就是由两家分别专营线上出行和电子商务的本土平台合并而来。由此可见，增长期的本土数字平台在用户的数量、领域与层次方面均取得了突破，围绕用户进行的数字生态系统构建已然成为本土数字平台展开竞争的新场域。

总体来看，由于资金来源更具独立性、政企联系更加紧密、用户群体显现出了跨领域的特征，增长期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开始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行为体，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愈加举足轻重。

### （三）瓶颈期（2024年至今）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印尼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本土数字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印尼的数字经济增长潜力，放眼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本土数字平台发展较为成功的案例。以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为依托，数字经济成为近年来印尼经济增长的亮点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在2024年后逐渐进入了瓶颈期，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均遭遇了一定的困难。

在国内，本土数字平台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政府逐渐收紧的监管政策和用户拓展边际成本的上升。在政策方面，印尼政府对本土数字平台的态度逐渐转向支持与治理并重，尤其注重防控“数字垄断”带来的潜在风险。印尼是较早在政府中设立反垄断机构的东南亚国家，在1999年就设立了印尼竞争监管委员会（KPPU）来负责管理国内的垄断问题（Lee, 2022）。数字时代到来后，该委员会曾于2019年发布《电商部门商业行为研究报告》（Penelitian Perilaku Pelaku Usaha di Sektor E-Commerce），2020年发布《数字经济领域的商业行为体和市场结构研究报告》（Penelitian Pelaku Usaha and Struktur Pasar Pada Sektor Ekonomi Digital）等，对数字垄断问题进行研讨。总体来看，印尼政府部门的施政目标仍以促进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为主，目前已经实施的反垄断处罚大多针对国际数字平台。不过，已经有印尼本国学者建议要进一步扩大并明确竞争监管委员会的职责以适应数字时代（Setyawati等，2024）。预计未来印尼本土数字平台面临的国内监管将不断增多。

在用户方面，本土数字平台吸收国内用户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从整体上看，印尼距离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还有相当大的距离。2024年，印尼的互联网接入率约为79.5%。<sup>⑦</sup>从印尼约2.8亿的人口总量来看，应该还有增长空间。然而，目前尚未进入各大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印尼民众中有相当部分不具备数字接入能力，他们或是因为年龄过大或受教育水平有限，或是地处印尼农村或外岛，暂未步入数字化时代。另外，印尼还存在相当部分的数字“落后者”（Laggard），这一群体尽管已经接入了互联网中，但对数字化的生活并不感兴趣，需要创造相应的激励来转变其互联网使用习惯。受上述因素影响，印尼本土数字平台逐渐由增量竞争转为存量竞争。以电商领域为例，2017—2024年印尼电商平台用户从3 268.7万增长到了6 565.5万，复合年增长率为10.48%，然而预计在2024—2029年，用户数量只能达到9 909.7万，复合年增长率下降至8.58%。<sup>⑧</sup>目前，已经有一些曾经较为成功的本土数字平台宣布放弃原有领域，另谋生路。而数字平台“赢家通吃”现象的存在，也使得小型本土数字平台越来越难以出头。

在国际上，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虽然从增长期起就积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拓

展业务，但也面临着资金和政策两方面因素的挑战。资金方面，印尼国内成长起来的数字平台，其资金实力并不能与国际资本匹敌，在进入国际市场后，在印尼积累起来的用户群体无法转移，仅有代码等无形的数字资产可重复使用。因此，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在国际化道路上，需要再次经历从萌芽期到增长期的发展轨迹，必然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此外，印尼本土数字平台与其他国家本土数字平台的经营范围还存在一定的同质性问题。如前所述，各国本土数字平台得以兴起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跨国数字巨头的网络效应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具有此种特质的数字经济领域在各国较为类似。例如，在东盟内部的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近年来也同样出现了网约车、线上出行和金融服务等本土数字平台，尽管在规模上不如印尼的本土数字平台，但还是大大提高了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在上述国家的市场进入门槛，加剧了其开展国际化业务时所面临的资金问题。

在政策方面，印尼本土数字平台与国内政府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跨国场景之下却很难奏效。以印尼最具特点的网约摩托车平台为例，如前所述，印尼政府在平台发展关键节点上的支持是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最早向其他国家拓展的本土数字平台之一，其在进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时，当地政府没有给予其持续的政策支持，甚至宣布这一业务非法，直接断绝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国际化道路还将面临法律体系不同的挑战。数字经济作为新兴领域，其在发展初期大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作用之下，各国又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监管体系。以泰国为例，其在东盟国家中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较为开放，在为数不多的“独角兽”企业中包含了加密货币交易所。然而，印尼等其他东盟国家对加密货币的态度并不明朗，尚未出台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加密货币行业。显然，这也将成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进行跨国发展的挑战。上述国际层面的问题虽然在增长期就已经出现，但瓶颈期内的本土数字平台国内发展速率下滑，因此从侧面放大了其在国际发展方面的困难。

总体来看，处于瓶颈期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不仅在数字生态系统的搭建方面有多项难关需要攻克，其国际化的道路也任重道远。

### 三、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对印尼经济的影响评析

印尼本土数字平台从萌芽期、增长期到瓶颈期的发展历程，从时间来看与印尼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化进程同步，属于印尼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历程及其与资金、政策和用户之间互动关系的回顾，本文将从消费、生产、投资三个方面试图分析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对印尼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判断其得失，以期为其他国家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借鉴。

### （一）更贴合印尼民众的新型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消费鸿沟

新型消费是基于新技术等形成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数字平台是新型消费生成的重要场景。相比于国际数字平台，从萌芽期一路走来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凭借与用户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所提供的服务更加贴合数字时代印尼民众的新型消费需求，主要体现在其在服务内容和 service 群体两方面的优势。

在服务内容方面，本土数字平台更能满足印尼民众的个性需求。新结构经济学指出，后发国家需要依据本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技术，才能实现比先发国家更快的增长（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若将对本国民众数字需求的了解视为一种比较优势，则可以解释本土数字平台为何能够在部分领域脱颖而出。以本土电商平台的发展历程为例，印尼民众消费欲望强烈，但信用卡普及率和对线上购物的信任程度较低。对此，印尼本土电商平台大力推广“先买后付”服务，并凭借对国情的了解不断提升货到付款的服务水平，以保证平台内交易的成功率。相比于国际电商平台在印尼的运营，本土电商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印尼民众的新型消费需求。目前，本土数字平台与国际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可见本土数字平台的这种比较优势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

在服务群体方面，本土数字平台的用户群体更加下沉，这是与本土数字平台在服务内容方面的优势相辅相成的。国际数字平台起源于发达国家，在进入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时，其服务内容往往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更相适应。然而，印尼的中产阶级群体称不上广阔，城镇化比例不高，农村人口群体庞大，本土数字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则能更好地兼顾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例如，在印尼非城市地区广泛存在的“小卖部”（Warung），服务内容高度相似但在传统时代相互独立。本土数字平台凭借对国情的了解，巧妙地利用“小卖部”来进行电商、外卖和线上票务等服务的拓展。印尼低收入群体起初仍使用现金支付，但很快就被便利的数字支付所吸引，截至2024年，印尼收入后40%的群体中也有43%能使用数字支付，这一比例与收入前60%的群体仅相差6个百分点，要好于两者在银行服务使用率方面的差距，<sup>⑨</sup>数字支付在印尼的普及可以很好地佐证本土数字平台对下沉市场开拓作出的贡献。

总体来看，本土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印尼存在的消费鸿沟。消费鸿沟指的是由数字鸿沟产生的数字消费不平等现象，其直接影响到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福利水平。相比于国际数字平台，印尼本土数字平台为更多原本处于“鸿沟”之外的民众提供了进行数字消费的机会。随着本土数字平台涵盖用户领域的不断扩展，新型消费的规模也将继续扩大，最终将形成由本土数字平台为主要支撑，独具特色的印尼国内消费市场。

### （二）为印尼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但与制造业联系尚不紧密

本土数字平台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特征，决定了其在用户端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将传递

到生产端，为印尼的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印尼曾长期被荷兰殖民，独立后一直拥有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渴望能够在产品生产中自给自足，这种对本国生产的偏好延续到了数字时代。例如，印尼本土电商平台经常为本国产品提供更多的曝光机会和用户购买补贴活动，活动期间印尼具有本地生产能力的身体护理产品、食品饮料产品等销售额均有明显提升。更加重要的是，本土数字平台还正在成为印尼实现国家级产业政策推行的重要伙伴和依托。比如，近年来印尼政府希望依托镍矿储量优势发展电动汽车和摩托车下游行业，但受制于基础设施和价格等原因发展并不顺利。面对这一困境，印尼的网约车和摩托车数字平台开发出了为司机提供电动车租赁的运营模式，已经成为电动车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国际数字平台相比，本土数字平台由于带有民族经济性质，更有动力为政府的政策提供支持。

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均重视数字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赋能作用，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是产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中最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之一（牛东芳等，2024）。然而，当前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虽然在消费端对产业转型升级有所助力，但与制造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主要原因是其所吸引的外资主要来源于国际数字巨头和风险投资公司，这些外资的进入尽管附带了部分技术，但其主要为非生产性的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平台管理技术，在传统制造和智能制造两方面带来的技术增量较低。在传统制造方面，由于国内生产力不能完全满足民众的新型消费需求，因此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只能选择进口商品来补充。尽管印尼已经在法律层面规定了进口产品的本地化生产比例要求，但参与的制造环节仍多为组装等低端环节，本土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未能缓解“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若不能抓住当前由国际产业链转移和人口红利带来的机会窗口，实现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为印尼制造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将停留在纸面，大量进口外国产品来满足数字需求的情况甚至已经在印尼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问题。

在智能制造方面，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带来的计算机技术增长的贡献也相对有限。印尼的工业自动化转型在亚太地区相对较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公布的人工智能准备指数中，印尼得分也只有0.52，与亚太地区的平均得分持平，但落后于新加坡的0.8、马来西亚的0.63和泰国的0.54。<sup>⑩</sup>从历史上看，本土数字平台带来的技术增量不足的情况，和印尼诸多大型财团在获得垄断地位后未能完成技术创新升级有一定相似之处，纵观历届印尼政府对本土数字平台发展推出的政策，其也相对较少关注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应当引起印尼政府的警觉。

### （三）衍生出的本土数字生态系统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

从历史上看，印尼吸引的外资大多集中于初级产品开采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部分下游产业。如前所述，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外资的大力支持。而在头部本土数字平台崛起后，本土数字生态系统将成为外资投资的新增长点，这主要与其吸纳的本土用户以及为用户服务的数字配套产业两方面相关。

在数字生态系统所整合的用户方面，由于本土数字平台的用户面向兼具中产阶级和下沉市场，市场的规模效应更强，为外国投资提供了动力。印尼的人口集中于爪哇岛，但外岛人口也占据相当比例，是典型的具有人口“长尾效应”的国家。在传统经济时代，外岛人口由于具有过高的边际成本而往往被排斥在国家经济运行系统之外。数字时代，原本具有高度同质性但彼此独立的农村已经被本土数字平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对于希望在印尼广大农村地区展开投资活动的外国企业来说，与本土数字平台合作是兼具效率与收益的选择。

在数字配套产业方面，本土数字平台当前技术增量不足的劣势反过来为外资进入数字配套产业提供了机遇。相比于本土数字平台，国际数字平台的技术优势明显，往往在进入新兴市场时就已经拥有了数字配套产业。为了弥补在相关配套产业方面的差距，争取国际先进企业的投资是本土数字平台的必然选择。面对印尼庞大的市场，国际先进企业也乐于开展此类合作。例如，为了提高印尼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能力，英伟达等国际巨头已经与印尼头部本土数字平台共同投资建设了专为印尼本土语言设计的大模型 Sahabat-AI，而其关联的教育和农业等产业将在未来持续为印尼吸引投资。

#### 四、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前景

2024年10月，普拉博沃正式就任印尼第八任总统。本届普拉博沃政府组建了大联合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意愿比较强烈。从政府的视角来看，如何通过政策来调整本土数字平台与资金和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成为其任期内的施政重点。受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的影响，本土数字平台的资金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增长，因此普拉博沃政府的施政重点将聚焦于推动本土数字平台的包容性发展，以实现更好的平台—用户关系。不过，在政府政策之外，国内与国际的宏观发展形势同样也将影响到本土数字平台的未来前景。

##### （一）社会民众方面，本土数字平台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成为焦点

受国际贸易竞争条款的限制，普拉博沃政府目前没有也不太可能推出专门针对本土数字平台或数字经济的政策，但目前实施的部分政策也确实同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关注本土数字平台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问题。数字平台的发展催生了就业新形态，本土数字平台又因更“接地气”而成为数字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然而，由于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附着于本土数字平台的工作岗位具有非正式性，本土数字平台并没有被强制规定与这些就业人员签订用工合同，规避了印尼法律对正式员工的高福利待遇规定。此外，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又有集中于高技术部门的倾向。长此以往，本土数字平台积累的利润很难惠及民众。在印尼，以网约车司机、骑手等为主的社会群体呼吁对数字平台的劳务费压榨行为进行调查的声音一直存在。面对这一情况，普拉博沃虽本着发展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对本土数字平台进行强力整治，但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经济民

族主义的领导人，其也期待推动本土数字平台向包容性发展转型。例如，在普拉博沃政府的牵头下，本土数字平台正在为“免费营养餐”计划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等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在近期印尼政府宣布的各项经济刺激计划中，也包含了向网约摩托车司机等未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零工经济从业人员提供保险购买的优惠等内容。普拉博沃政府还正在继续完善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缓解民众对“数字剥削”问题的担忧。

（二）国内环境方面，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契合“数字下游化”趋势但存在政治定位隐忧

政府的政策为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指引，但具体效果如何还需要考虑印尼客观的数字发展环境。当前，在数字经济中引入“下游化”的思维逐渐成为印尼社会的共识。“下游化”（Hilirisasi）是印尼近年来基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思想，而实施数字“下游化”则最早由现任副总统吉布兰在大选辩论时提出，主要思想包括加快培养本土数字企业并对本土数据进行充分使用，也有印尼学者将其解读为应当根据印尼的文化和兴趣来设计算法逻辑，而不是一味照抄国际产品。<sup>⑩</sup>显然，“数字下游化”思想的传播有利于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

然而，本土数字平台在印尼国内政坛中的定位仍不清晰。与国际数字平台相比，本土数字平台除了扮演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其还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作为以印尼本土为主要经营范围的企业，本土数字平台也理应在印尼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其发展已经给印尼的央地关系和劳资关系等带来了困扰。从央地关系方面来看，由于本土数字平台的总部大多位于雅加达、万隆和日惹等大型城市，但业务却遍布印尼各地，这可能造成数字税收与税源分离的情况，税收将向大城市聚集。在央地分权改革开启后，地方财政问题已经成为印尼的一大政治问题，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不具备调整空间。数字时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本土数字平台的三边关系协调无疑将更具难度。从劳资关系方面来看，尽管普拉博沃政府已经开展了积极的协调工作，但来自本土数字平台的集团压力将限制政府政策的效力。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数字时代劳工权益的重要保证，但令人担忧的是，印尼政府在如何处理与利益集团关系，以及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一直以来的表现不尽人如意。总体来说，如何处理本土数字平台的政治定位问题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模板，各国的国情也大相径庭，印尼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之路确实困难重重。

（三）国际发展方面，推动本土数字平台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

向国际市场进行拓展是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进入瓶颈期后的必然选择，而印尼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身份赋予了本土数字平台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机遇。当前，印尼正积极在大国、东盟与全球南方三个层面开展国际数字合作。在大国层面，中美均是数字经济大国，培养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数字平台，在数字领域的战略竞争激烈，而印尼在整体层面保持了大国

平衡的姿态，并将数字经济作为与中美合作的重点议题。在东盟层面，作为“老东盟”成员国，印尼拥有丰富的东盟地区合作经验。如今，东盟已经在数字准入、数据传输、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等数字领域的地区合作中取得了不俗进展，是世界上数字合作水平较高的地区。印尼作为东盟的“天然领导者”坚定地支持东盟的数字化转型，而地区国家也多认为印尼将是地区数字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在全球南方层面，印尼2025年初已成为金砖正式成员国，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地位凸显。无论是在联合国和金砖组织等整体性合作中，还是与欧盟、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与地区的双多边合作中，印尼均重视开展数字外交，这为本土数字平台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国际合作的推进将为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缓解资金问题提供新路径，也能为其提供更大的用户群体。

然而，来自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压力和全球数字版图的“碎片化”发展倾向给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带来了较大挑战。在美国与印尼的关税谈判中，确保印尼本土数据向美国的自由流动是美方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印尼政府较为严格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措施是本土数字平台快速增长的政策保证，也是当前印尼开展数字下游化的重要一环。印尼本土数字平台是否能保持对国际数字平台的这一比较优势？美印尼关税谈判的结果将对此造成一定冲击。另外，当前全球数字地缘政治中的大国竞争态势，以及国际数字合作中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等也将推高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国际化发展成本。

## 五、结语

本文基于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资金、政策和用户的三要素分析框架，对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的历程、影响和前景进行了研究。由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发展在全球南方中具有代表性，因此上述三要素分析框架对分析全球南方本土数字平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和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培育出了多种数字平台经济商业模式，正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一批企业已经成长为跨国数字巨头，中小型数字平台也正在加速出海。然而，中国数字平台在出海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方面的挑战。结合前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可在以下两方面同印尼展开合作。

一方面，可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共同展开在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帮助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突破用户瓶颈。中印尼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目前中国企业与印尼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虽然在城市地区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但在非城市地区还未能实现广泛覆盖。这一方面是由于对非城市地区缺乏了解，存在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此类投资的收益相对较低，企业积极性不高。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对非城市地区的情况更加了解，且非城市地区的数字接入将带来经济收益，在两方面均能同中国企业形成互补。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支持还能为中国企业争取到印尼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在印尼非城市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成为中国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生

动写照，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

另一方面，应鼓励拥有尖端技术的中国企业在印尼拓展市场，以帮助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突破资金瓶颈。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数字生态系统的搭建需要将新兴技术纳入其中，然而美西方出于维护数字霸权的目的很难向印尼进行带有实质性技术转让的投资，印尼本土数字平台自主发展尖端技术也面临缺乏资金的问题。中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等领域已经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与美国等国相比，具有尖端技术的中国企业目前还未能在全球数字生态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这既是中国本身就具有庞大的市场来满足企业的营收需要，导致在技术发展前期中国企业往往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耕耘，也是因为中国数字企业还没有很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数字商业拓展模式。实际上，尖端技术的出海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国内的内卷情况，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尖端企业的存活率，还能够改善中国所面临的数字地缘政治格局，扭转当前全球数字生态系统中所呈现的美国霸权格局。与印尼本土数字平台合作对中国尖端技术企业来说兼具效率与收益。

总体来看，印尼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印尼已经提出要共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基于数字平台的合作将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载体。在地区层面，中印尼可携手推进东盟数字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地区组织中，东盟在地区数字合作方面的表现较为亮眼，然而其也尚未能在数字平台合作方面设计出具有高效力的区域治理机制。以东盟出台的《2025年东盟数字整体规划》（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为例，其虽将“用数字服务联通商业并促进跨境贸易”作为“期待结果”之一，但其政策重心集中在加强网络安全治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对数字平台的发展关注不够，仅于“在其他司法管辖范围中监管数字平台的发展”一项中提及，且重要性评级为“低”。东盟目前正在就《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进行谈判，可期待该协议在促进各国数字平台合作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但也应认识到此类合作所面临的困难。根据本文分析，东盟内部的其他国家由于经济体量不如印尼，尤其是在用户数量方面不如印尼，在本土数字平台的发展方面将遭遇与印尼类似甚至更难突破的瓶颈。实际上，部分东南亚国家目前都还没有出现具备一定规模的本土数字平台。东盟地区在资金融通和用户数据联通等方面的协调，有助于各国共同突破瓶颈。中印尼作为地区内的数字大国，有责任共同推进地区合作。

中印尼合作也将为全球南方的数字合作提供有益启示。数字时代，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层面推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数字治理模式，不断巩固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垄断优势，全球南方国家则受限于整体实力、数字发展水平和集体行动能力等发展困境。中印尼以各自在国内市场中培育出的优秀本土企业为抓手，依托中国强大的数字基建能力和领先的数字技术，相互借鉴治理经验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将为全球南方加强数字合作树立参照样板。

## 注释:

- ①参见 [https://www.antaranews.com/berita/50324\\_09/prasasti-ekonomi-digital-kunci-mencapai-pertumbuhan-ekonomi-8-persen](https://www.antaranews.com/berita/50324_09/prasasti-ekonomi-digital-kunci-mencapai-pertumbuhan-ekonomi-8-persen)。
- ②参见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10/26/jokowi-set-visit-two-technology-giants-silicon-valley.html>。
- ③参见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5/12/18/transport-ministry-bans-ride-hailing-apps.html>。
- ④参见 <https://setkab.go.id/en/gojek-should-not-be-banned-presiden-joko-widodo-says/>。
- ⑤参见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46811842/Indonesia-Online-2010>。
- ⑥参见 [https://tracxn.com/d/unicorns/unicorns-in-indonesia/\\_Gabk9o4-P2xW7AZRrT8haLoLFNAhqb6k8Q3k\\_DQVXtY](https://tracxn.com/d/unicorns/unicorns-in-indonesia/_Gabk9o4-P2xW7AZRrT8haLoLFNAhqb6k8Q3k_DQVXtY)。
- ⑦参见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304593/indonesias-internet-penetration-hits-795-percent-trend-continues>。
- ⑧参见 <https://www.statista.com/forecasts/1348840/southeast-asia-total-e-commerce-users-by-country/>。
- ⑨参见 <https://digitalfinance.worldbank.org/country/indonesia>。
- ⑩参见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AI\\_PI@AIPI/ADVEC/EME/LIC/APQ](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AI_PI@AIPI/ADVEC/EME/LIC/APQ)。
- ⑪参见 <https://news.detik.com/kolom/d-7947720/hilirisasi-digital-tantangan-dan-solusi-di-indonesia>。

## 参考文献:

- [1]郎昆,郭美新,龙少波.数字经济与新型全球化: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J].上海经济研究,2023(7):103-117.
- [2]李若昕,张帅.印度尼西亚数字农业发展现状与中印尼合作展望[J].农业展望,2025(1):19-27.
- [3]林梅,周淑瑜.印尼数字经济发展及中国与印尼的数字经济投资合作[J].亚太经济,2020(3):53-64.
- [4]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4):53-74.
- [5]牛东芳,蒋贵,黄梅波.东南亚数字产业发展的区域竞争优势研究[J].南洋问题研究,2024(3):63-84.
- [6]欧月明.中国印尼跨境电商合作的特征、挑战与对策建议[J].市场论坛,2023(1):31-38.
- [7]潘玥.“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印尼佐科政府的理念与实践[J].东南亚研究,2024(4):22-40+154-155.
- [8]夏方波.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的数字经济发展探析[J].中国周边外交研究,2021(1):234-235.
- [9]夏敏,魏江,杨洋.平台企业国际化: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南开管理评论,2025(7):4-16.
- [10]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62-81.
- [11]尹楷璐.印尼数字生活市场:Grab与Gojek的竞合之路[J].中国对外贸易,2025(7):36-39.
- [12]张镒,刘人怀,陈海权.平台领导演化过程及机理:基于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9(5):152-162.
- [13]DELLYANA D, ARINA N, FAUZAN T R. Digital innovative governance of the Indonesian creative economy: A governmental perspective[J]. Sustainability, 2023, 15(23): 1-14.
- [14]HAYATI A N. The issue of dark patterns in digital platforms: The challenge for Indonesia's consumer protection law[J]. 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24, 11(4): 453-465.
- [15]HISYAM C J, RODJA Z, SALSABILA N, et al. Transformasi sosial-ekonomi dalam era ekonomi digital: Analisis sosiologi ekonomi terhadap dinamika platform online[J]. Jurnal ilmiah ekonomi manajemen bisnis dan akuntansi, 2024, 1(2): 1-13.
- [16]LEE C.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 Challenges for Indonesia[J].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22, 58(3): 297-312.
- [17]MUIN I. Perlindungan data pribadi dalam platform e-commerce guna peningkatan pembangunan ekonomi digital Indonesia[J]. MJP journal law and justice, 2023, 1(2): 81-91.
- [18]PARK M, GANDHI A, BUDIMAN N J A, et al. Contextualising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Policy and reality in Jakarta, Indonesia[R]. Manchester Centre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2025.
- [19]PRASETYO E H. Digital platforms' strategies in Indonesia: Navigat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formal economy[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4, 76(1): 1-9.
- [20]SETYAWATI R, KOOS S, JATMIKO Z. Data driven dominance in digital markets: assessing Indonesian competition law

in the digital age[J]. Jurnal IUS kajian hukum dan keadilan, 2024, 12(2): 264–284.

[21]TOBING N, ADOLF H, ROMPIS A, et al. Platform sovereignty and legal reform in Indonesia: Aligning with global for a digital future[J]. Veredas do direito, 2025, 22(3): 1–19.

[22]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190–207.

##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mpact and Prospects of Indonesia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FAN Jiaqi XU Liping

**Abstract:** Digital platforms are cru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also begun to rise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is a typical case among ASEAN and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Based on industry life cycle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capital, policy and users, deduces and demonstrates that under the evolu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the Indonesia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will experience three stages covering embryonic stage, growth stage, and bottleneck stag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has narrowed the digital consumption gap,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it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However,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still not close enough. The outlook of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is positive since President Prabowo’s policy prioritizes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and local platforms also aligns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digital “downstreamization”. However,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still need to find their position in local politics, and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o thei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s based o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will become a key aspect of China–Indonesia 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hich will help Indonesian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break through bottlenecks. The bilateral digital platform cooperation can also promote regional digital interconnectivity,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digit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Keywords:** Indonesia; Local Digital Platforms; Capital; Policy; Users; Digital Economy

(责任编辑 金师波)